

历史记忆的战争与历史书写的伦理

——有关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之战”

唐 小兵（华东师范大学）

题注：“失忆”的反义词不是“记忆”，而是“正义”——韩国学者白永瑞

关键词：记忆的战斗，战斗的记忆，理性、情感，认同

战争与革命是 20 世纪中国前半期最重要的主题，而对战争与革命的历史书写和历史记忆，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学术性的命题，而同时是中国社会如何面对过去的历史、进而很可能刺激记忆领域的纷争与冲突的导火线。任何对历史的表达，都隐含着一种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文化的理解方式，而那些试图突破历史记忆固有框架的书写，往往会引发公众和政府层面强烈的反响或反弹。军旅作家张正隆《雪白血红》在 1980 年代的末期出版，几乎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却因为龙应台的作品《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等重新浮现在世人的眼前。龙应台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文化名人的号召力，将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东北悲情往事，再度拉回当代华人世界的感觉世界之中。然后，龙应台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亲爱的，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道、大大小小的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¹这只是《大江大海》的一个小插曲，而这本轰动一时的作品主要是通过文献梳理、历史遗迹寻访和口述访谈等多种形式，还原或重构了国军将士（包括远征军）在乱世中的命运，尤其此后被历史刻意遗忘的一面。

¹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 年版，第 200 页。

作为“战败者”的后代（其父龙槐生系国军将士），龙应台试图为被历史叙述遮蔽的这群人争回一个应有的纪念位置：“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战争，有‘胜利者’吗？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²龙应台试图站在一个人道主义的立场和非战的立场，对一切战争的失败者和受害者提出一个控诉，但“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是什么，它是一个基于现代文明（比如自由、民主、平等诸人权）的普世价值，还是个人因参与追求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具有尊严的特殊性内涵，龙应台语焉不详；再者，龙应台将内战时刻的国共纷争造成的牺牲与苦难（这种内争很难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划出一道明确界线）与抗日战争过程的南京大屠杀、反法西斯战争的列宁格勒保卫战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以后者在公共领域和国家层面大规模的历史记忆来映照前者的被“遗忘”，就等于抹杀了不同类型的战争之间的差别性。这种“以失败者为荣”表面上是以对“弱者”和“卑贱者”的人道主义同情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但其实更多的是以家族、血缘、团体的身份认同为核心而构建了承认的谱系，其中隐含了一个未必能够不证自明的预设：失败者天然就代表正义。

历史记忆更深刻地指向为父辈讨还一个历史的公道，形成的是代际之间的记忆传递和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国共双方也同样致力于各自记忆宫殿的建造。长春围城，在国共两方的记忆里呈现的是几乎完全不同的面相，对国民党而言是屈辱体验，对中共而言是“兵不血刃”的凯旋。这凯旋中间又夹杂着“晦暗的血污”，因此不太可能去开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相。与记忆相对应的是遗忘，但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所言，遗忘并非纯粹“消极性”的心灵生活，而“遗忘研究给历史学带来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用新的眼光看历史：原来我们所能了解的历史史实，不过是被种种力量筛选过的、幸存下来的碎片，另外那巨量的史实，都已被屏蔽和排斥在我们的记忆库之外了。我们无法了解的那些，有相当一部分是前人认为不应该或不值得为后人所了解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固然可以称为失忆（*amnesia*），或曰历史记录的空白，但这种失忆和空白，一定程度上是遗忘（*forgetting*）造成的，是前人积极行为的结果，是符合前人预期的。”³对长春围城，或者更广泛的20世纪中期中国的内战史，我们都可以从“记忆”与“遗忘”的双重视角去探测。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克的，一方要强迫遗忘而另一方就要强化记忆，有时候记忆与遗忘是相生的，在遗忘“非正义的战争暴力”的前提下发扬胜利者的记忆，有时候胜败两

²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扉页。

³ 罗新：《遗忘的竞赛》，《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3月8日。

方都是刻意要从公共生活中抹掉一些历史的痕迹，让民众“积极地遗忘”甚至不去观看某部分历史区域的真相。自然，民众和知识人并非木偶，他们有时候会从这重重历史记忆和遗忘构建的“存在之网”中挣脱出来，去复原对历史的真实感知。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大陆两个历史学者那里引发了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已故历史学家高华为此书撰写的长篇评论《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纵横捭阖，文采斐然，将台海两岸在1949年前后的大变动，从政经大脉络和历史人物小视角展开分析，结合龙应台的记述将“悲情一九四九”的历史内涵及其后续影响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高华对此书评价极高，认为该书的基本特点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到台湾，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⁴高华进而指出，《大江大海》的旨趣是：“以普世价值观，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⁵高华抽绎出龙书的价值核心是“普世价值”，而其历史观是“人文的、人道的史观”，并充分肯定这种聚焦在小人物生命故事的历史叙述是拆解被政治主导的意识形态叙述的有效方式。

在高华看来，龙应台将“内战的是非功过”的价值评判悬置了起来，因而是在一种人道主义心情之下的历史写作，将所有战争的受难者与幸存者都放置在历史记忆的天平上同等地书写。但龙应台自身又特别标举其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那么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龙应台认同失败者的价值、思想与行为，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是战争中的败者因而容易被赋予同情的视角？如果如龙应台所言，战争无所谓胜负，那么何以她又旗帜鲜明地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一方面，《大江大海》似乎在一种人道主义的悲悯情怀和聚焦小人物的历史

⁴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⁵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叙事中试图实现历史的大和解，另一方面，《大江大海》又如此强烈地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国之哀与国共两方中选择站队。这岂非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对这个症结有精彩的诠释（未知龙应台本人是否同意）：“国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政府1949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⁶

相对于高华对《大江大海》的极度推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教授在一篇短文中，很尖锐地抨击龙应台在该书中的历史观为“炮灰史观”：“所有战争，包括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并不是靠单纯的人道主义告诫就能理解的。我相信，龙应台这位年近花甲、见多识广的‘小红帽’在踏入历史丛林之后，肯定遇到不少与她观点相左的狼外婆，但结果是‘小红帽’太强悍了，每一次都能用汹涌的修辞顺利击昏狼外婆。于是，南洋岛山打根集中营里屠杀国民党军战俘的台湾监督员，与血战淮海食不果腹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密集冲锋不顾死活的解放军士兵，统统变成了飘散到战争尘埃中的悲情线偶，由历史的偶然所操控，这些跨民族、跨疆界、跨海峡的恢弘叙事，揭开的是一整代人‘隐忍不言的伤口’，让他们血迹斑斑地尽情喷洒，然后任由记忆的血水灌流进当代人麻木的心里。为被践踏、被侮辱伤害的失败人群立传，结论当然是战争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当交战搏杀的暴力被不论轻重、不分界线地指责，任何战争的意义都会从此彻底消解，‘炮灰论’刹那间炸出人们的眼泪，‘正义论’对胜负的书写当然就会在泪水中变得模糊不清。”⁷换言之，在杨念群看来，这种诉诸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的历史叙述，所构建的其实是在本质上无差别的悲情故事，等于是完全消解了战争的意义，也就是消解了投身或者说献身战争的将士的生命主体性，每场战争的卷入者都成为被忽悠和被利用的“炮灰”，在战场上死过一次的当事人，还得在历史记忆的领域以“复活”的方式在“生命意义和价值”上再死一次。并且，杨念群质疑龙应台在搜寻史料并构建历史叙述的时候，自动剔除掉了那些与其“人道主义的立场”相悖的证据，从而也就失去了真正进入历史的可能性。

这触及的其实就是面对20世纪中国的中期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各执己见的个体经验的书写与记述究竟是会推动历史和解还是其实在阻碍历史的和解？历史的大和解何以可能？

⁶ 高华：《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领导者》总第34期，2010年6月。

⁷ 杨念群：《龙应台炮灰史观的煽情与阙失》，共识网，2013年12月15日。

战争创伤如何抚平？我们是否能在具体地理解投身战争的个人的心情与境遇的基础上来讨论个人与时代的相遇？同情的理解是否就意味着批判性和反省力度的弱化？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人际、代际、党际之间的对话与和解中应该和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吴乃德在一篇讨论二二八事件的文章曾如此谈及历史记忆的真实性与模糊性之间的关系：“为了和民族当前的想象和渴望产生共鸣，历史记忆必须加以剪裁。‘记忆’和‘历史’因此经常不完全重叠。‘集体记忆是非历史的（ahistorical），甚至是反历史的（anti-historical），对某一个事件作历史性的理解，是了解其复杂性，是从疏离的立场、以不同的角度加以观看，是接受其道德的模糊性。集体记忆则将历史中的模糊加以简单化，甚至加以消除。’可是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同时，模糊的历史记忆或能点燃某些人的热情，却必然失去对其他人的号召。由于不同族群、不同立场的团体具有不同的历史经验，模糊的历史必然无法成功地营造共同的历史记忆。而共同的历史记忆却是民族形成的重要条件之一。或许——只是或许——如某些历史家强调的，‘除非历史记忆以学术标准为基础，否则我们对记忆的责任只是一个空壳。’”⁸

龙应台似乎也意识到了历史写作的局限性，她在书中坦承：“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⁹吴乃德聚焦的是“模糊的历史记忆”和“道德的模糊性”，前者是指历史被裁剪、压制、刻意引导、遗忘等之后形成的“笼统印象”，而后者是指人在具体的历史变动之中其实很难给其行动一个道德上的裁断，这隐含的一个预设是历史书写者并非“全知全能”，所以他对自身在道德、价值和趣味上可能的偏向，以及这种偏向可能导致的对历史认知和历史阐释的误导，应该存有一份冷静的反省。¹⁰史华慈曾说，历史研究永恒的困境就是得面对“人的不能全部破解的存在意义上的复杂性。”龙应台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回看历史，并且意识到了自己只能相当个人化地传输“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但其为“失败者”写痛史的心志过于

⁸ 吴乃德：《历史记忆中的模糊与未知》，台北：《思想》，第21期，2012年5月。

⁹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174页。

¹⁰ Timothy Brook 教授也曾指出过：“历史研究者不能塑造道德准则，也不能制造道德知识。历史研究者的任务不是提出错误的观点来抨击过去的历史参与者或现在的读者，而是调查在某时某地产生道德准则的标准和条件以便进行研究。”详见氏著：《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81页。

强劲，为父辈做传的心情过于激越，以至于她忘记了其回溯历史的初衷而抹掉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越是充满对复杂性的理解的写作和记忆，就越不可能让读者在情感上迅即卷入，而大多数的读者试图从历史中捕捞的记忆往往是他自我投射的认同与情感，人在历史长河试图打捞的往往是他翻转的身影。这就是历史与记忆之间永恒的张力。

正如吴乃德所言：“简化的、甚至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论它负载多么巨大的道德教训和启发，显然违反理性社会对真实的追求，而且也将不断受到历史学者、后代，特别是不同立场者的挑战。”作为战败者的国军，对于台湾岛的本土居民而言，却又是强势的介入者，在弱者之下更有层层弱者，这就导致正义与伦理的界定变得异常艰难。在前引许倬云等人认同的大陆上层精英引入台湾的积极后果，在另一些本土精英看来，却是强烈地压抑了地方性的政治和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

笔者曾经在讨论中国大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历史和解”问题时提出：“对于社会共同体的自我更新和文化遗产来说，让记忆呈现出来是一件既必要又特别艰难的事情。记忆自然不是为了煽动仇恨，而历史写作更非如此。记忆更多的像一个民族的自我疗救，而讲述本身也成为一种不断修复一个社会集体创伤的独特形式。”¹¹我想，这个议题对于两岸知识人、政治人物和民众而言，具有相近的重要性和急迫性，所以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广和纵深的视野里来开掘其价值、探寻其方法、反思其效果。

2009年台湾出版（2013年由北京三联出版简体字版）的另外一套在知识界和公众社会引起持久反响的是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尤其是以一名国民党宪兵和解放军战俘的视角讲述1945-1949年内战历史的《关山夺路》更是获得了包括高华、王奇生等历史学家的高度认可。王奇生指出王鼎钧：“强调自己写的是一位‘小人物’的回忆录。他更多地写世事的沧桑，而不是个人的名利得失。他试图呈现一个小人物在动荡剧变的历史年代难以自主的命运。他以其职业性的敏锐观察，将乱世的各种人情世态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并以具体的情境事例，将自己数十年累积的阅历感悟，一一述出，平心静气，边叙边议，不见煽情，不见呐喊，却触及灵魂。”¹²作为回忆录的《关山夺路》在历史叙述上展现出了几重张力，而这些张力或者说叙述困境的存在，恰恰丰富了作者的叙述层次，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对读者固有的认知历史框架构成了挑战。从对国共两党成败之因果的探寻来说，王鼎钧对作为失败者的国民党及其军队似乎并没有同情，他费了最多的笔墨

¹¹ 唐小兵：《让历史记忆照亮未来》，《读书》，2014年第2期。

¹² 王奇生：《真实的历史比小说精彩——读王鼎钧回忆录》，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年3月29日。

试图寻找强弱转化之道。就战败的日本与国民党、苏联军队三方而言，他对于作为胜利者的后者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认同，反而有意选择对战败者的“尊严”做更多的记忆与书写。因此，王鼎钧的历史记忆的价值基点就不再是简单的人道主义逻辑（当然，纵览全书，他始终对弱者、失败者有同情感），也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饶有意义的挑战：面对 20 世纪中期的战争记忆，我们的立足点究竟应该归置在何处？这场战争能够用正义与非正义来严格区分敌我双方吗？道德的模糊性与情感的强烈性，居然如此奇特地搅拌在一起，冲击着我们理性的堤坝。比如书中第一部描述的抗战胜利后“日俘日侨”这一节文字，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勉力维持其体面和尊严，保持着整洁和秩序，没有悲情呐喊，更没有摇尾乞怜，以至于作者说“无论如何，日本军人的品质是优秀的，日本政府浪费了他们。”¹³而与之相对照，王鼎钧对国民党军队持负面的评价：“战地军官，军权至高，当地司令官以通敌和作战不力之类的罪名杀了多少人！结果高级将领以千万士兵做投降的资本，换一个新官位，他的部下经过改编整训，枪口换个方向，不是死在这个战场上，就是死在那个战场上，无论如何我不能承认这样的军人‘优于’那样的军人。”¹⁴而作为战败者的家属，日本女性通过出售物品、叫卖食物来维持生活，换回回归日本的旅费，顺从中介人的摆布为中国军官提供性服务从而为日本男人维持尊严。

王鼎钧的历史记忆充分地展现了面对历史时人的情感伦理的复杂性。从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来说，中国的抗战自然是正义的，但这种正义并不能保证在此之下中国军民的举止行动就是合乎正义或者伦理的，而作为战败者的日军及其家属，在这场战争记忆之中，似乎并不是被同情的弱者，却成就了“弱者的尊严”，仿佛成了应该被战胜者一方来尊重的对象。胜利并不天然象征正义，而失败也并不必然代表屈辱。王鼎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对人的理解、态度和情感，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吗？我们可以在一种消泯了个人的国家身份的前提之下，认真地对待历史中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吗？对战争的历史记忆能够构造我们与那个时代之间内在的连带感吗？如果超越了控诉史学或者成王败寇史学，那么史学又有怎样的意义？当我们顺应这种对失败者进行充分理解甚至尊重的逻辑之后，反思和批判是否就会成为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换句话说，对战争各方的记忆，其能够抵达的历史目标和道德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¹³ 王鼎钧：《关山夺路》，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 78 页。

¹⁴ 王鼎钧：《关山夺路》，三联书店，2013 年版，第 78 页。

结语

人类学家王明珂曾经指出：“历史不只有一种声音；许多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人群，都在争着述说自己的过去，争着将自己的过去一般化、普遍化，以成为当代的社会记忆，以抹煞他人的记忆。在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中，我们可以看见，有些人可以向社会宣扬自己的过去，有些人的过去被社会刻意发掘、重建。这是对过去的诠释权之争，也是认同之争，权力之争。”¹⁵对于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官方主导的历史记忆，还是民间自发的回忆录、口述史，或者作家、学者的历史写作，都试图将自身对于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理解和认知框架“一般化、普遍化”，而这种写作和记忆的情感动能往往是基于人道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基于对历史成败的理性反思，前者往往容易被批评悲悯遮蔽了理性，而后者又容易被指责理性化的反思，将淹没在历史结构和行动中付出生命的个体。尤有进者，有些学者甚至会认为关于这个时段的更多私人化历史记忆（比如这些年大量出版的回忆录、口述史等）的出现，非但不能推动人际、党际、代际之间的和解，反而会进一步撕裂中国社会，导致历史记忆的价值共识难以构建。¹⁶而就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苦难的认知与记忆而言，我们自然不能停留在对于政治和战争悲剧的控诉层面，而应该深入历史的肌理，将在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背后的潜在的结构因素挖掘出来，这才是历史记忆和历史写作的更高境界。历史记忆或者历史写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摸到的虽然只是一个“片面的局部”，却不乏深刻的具体性，而当每个历史回忆者和写作者意识到自己可能是“盲人”（会有个人的偏见、知识和信息的限制、表达能力和记忆能力的欠缺等），而大象却是一个难以被一次性完全触摸的整体的时候，他就会相对谨慎、谦卑地面对自己的历史写作。对 20 世纪中期中国的历史记忆，无论是龙应台的历史写作，还是王鼎钧的历史记忆，都不乏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通过引入历史资源来进行启蒙的动力，这里特别值得深思的一个有价值的主题就是：价值启蒙是否必须以尊重历史真实为前提？揆诸历史与现实，我们会发现启蒙与历史之间存在永恒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和困境引发的争执甚至冲突也经常在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中掀起惊天巨浪，搅动人心。或许，这才是我们追溯、检讨和写作这一页历史的时候不得不小心对待和处置的深层原因。

¹⁵ 王明珂：《自传、传记与口述历史的社会记忆本质》，台北：《思与言》，34 卷第 3 期，1996 年。

¹⁶ 这部分的思考，得益于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博士的一次深入讨论，谨致谢意。

■ 唐 小兵 (TANG, Xiaobing)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哈佛燕京访问学者。

研究领域集中在晚清民国报刊史、20 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与思想文化史、左翼文化与中国革命、回忆录、口述史与 20 世纪中国的历史记忆等领域。先后出版《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十字街头的知识人》、《与民国相遇》、《书架上的近代中国——一个人的阅读史》、《北美学踪：从温哥华到波士顿》等。主要作品在《发表》China Information、《新闻与传播研究》、《史林》、《中共党史研究》、《二十一世纪》（香港）、《思想》（台北）等海内外期刊。

曾获华东师范大学第一届青年教师育人贡献奖，2014 年获《东方历史评论》杂志评选的中国杰出青年历史学人荣誉称号（全国共十五位）。

主要著作：《战争、苦难与新闻——试论抗战时期民间报刊的舆论动员》，《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 年第 8 期。《民国时期中小知识青年的聚集与左翼化——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上海为中心》，《中共党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后五四的家庭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潮——以《中国青年》《生活周刊》《申报》为中心的讨论》，《天津社会科学》，2022 年 第 2 期。